

么人身危险。

但梁实秋说鲁迅收卢布，这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法律概念，当时诬人收受卢布，那是里通外国，具有叛国罪的嫌疑，是要入狱甚至断头的。

至于鲁迅对被“骂”对象的区别，当然是有的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个体存在，抨击的具体语境自然也有不同，怎么可能没有区别呢？鲁迅“骂”杨邨人是“革命小贩”，“骂”所谓“四条汉子”是“奴隶总管”，语气的轻重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，都不是构陷，都只是形象刻画，文学描述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被鲁迅怒骂或讽刺后，有一些回击的话语，这些回击话语中，有没有值得认真分析的“言之有物”的内容？

房向东：“言之有物”的话当然有。比如鲁迅与梁实秋关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问题的论战，有很多学理探寻。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文学只是描写人性吗？阶级性中的人性、人性中的阶级性等等，哪怕今天，都还有许多可探讨的空间。

“实骂”和“虚骂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鲁迅的“四面树敌”，是否是后来学界与社会对其存在争议，甚至不乏诬蔑之声的重要原因？今天的人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这一历史现象？

房向东：一个作家有争议是正常的，没有争议，除了平庸到不值得争议外，那一定是不让争议，这才是反常的。

1949年以前，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，被肯定、被否定，各种评价都有。1949年以后至1978年以前，就不让争议鲁迅，更不要说非议鲁迅了。

后来，对鲁迅又有种种争议甚至诬蔑。对这一现象，我是持平常心的。百家争鸣，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。当然，诬蔑鲁迅，这是特定时代的非理性逆反，你越不让争议，解禁后，我越要全面否定你。这与鲁迅不相干，最多只能说是一种“鲁迅现象”。

捧也罢，“骂”也罢，鲁迅就在那里，鲁迅还是鲁迅。

我倒是要对鲁迅的“骂人”现象，稍做提示。我认为，关于鲁迅的“骂人”，从某种意义上理解，可以分为“实骂”和“虚骂”两类。

所谓“实骂”，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，就事论事，不

及其余。比如，鲁迅与梁实秋关于“硬译”问题的争论，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，皆属此类。鲁迅的“实骂”，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。

所谓“虚骂”，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，然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灵感、引出话题的作用。鲁迅与引出话题的当事人并无直接冲突，所涉之事，亦无利害关系。这比较典型的应是梅兰芳。鲁迅“骂”梅兰芳，是“骂”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“太监文化”，是“骂”“男人看见‘扮女人’，女人看见‘男人扮’”的病态的社会人格，和梅兰芳本人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。

还有一种是“实骂”中带“虚骂”，虚实相间，由实而抽象为虚。我认为，鲁迅之“骂”杨荫榆，主要针对“女师大风潮”，“实骂”成分是很大的。但是，那篇被有的人认为有人身攻击成分的《寡妇主义》，却是“实骂”中的“虚骂”。文中，鲁迅指出杨荫榆是“寡妇”或“拟寡妇”，实行“寡妇主义”教育，对于大学生，“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，观察一切，见一封信，疑是情书了，闻一声笑，以为是怀春了；只要男人来访，就是情夫……”这些语言，都是不确定的推测，与杨荫榆所涉无多。其实，杨荫榆虽然独身，但她和鲁迅一样，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。我觉得，鲁迅关于“寡妇主义”的这种深切感受，可以说是郁积于长久，得之于偶然。他之所以如此不无刻薄地“骂”杨荫榆，只不过是找到了灵感的触发点，生发开去，借题发挥而已。心中有思想，总是要喷发的。若不是杨荫榆，在此后的某日，碰上了牛荫榆、马荫榆，一有机会，鲁迅关于“寡妇主义”的思想，还是要表白的。

鲁迅“骂人”文章的意义，表现在他“实骂”部分包含有“虚骂”的成分，鲁迅是具体的，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，拘泥于具体。他升华了，超越了，抽象了，成了哲学意义上的“一般”。

鲁迅的“骂人”，有“骂”对的，有稍感过火的，有误会等等，但这都并不重要。它的意义在于“实骂”中包含着“虚骂”的成分；而纯粹的“实骂”部分，也将不断地被历史虚化。鲁迅留给我们的超越个别、具体的一般和抽象，鲁迅的价值，在于他的“骂人”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、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。■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■

